



试论以权力结构调整促经济社会发展

——兼论政党制度对经济社会发展的作用机理

张屹山^a, 高丽媛^b, 辛本禄^b

(吉林大学 a. 数量经济研究中心; b. 商学院, 长春 130012)

摘 要: 在不断强化经济发展以确立国家地位的今天, 各国的政党制度都面临各自的发展难题。若要社会资源达到充分利用和最优配置, 努力实现在同一层级内不同社会主体权力对等, 同一社会主体权力与责任对称是其基本途径。十八届三中全会已经拉开中国全面深化改革的大幕, 无论是强化市场在资源配置过程中的决定性作用, 还是促进社会公平正义的深化社会主义改革, 其根本措施都是要改善社会权力结构, 只有完善的社会权力结构才能充分发挥中国政党制度的优越性, 才能推动中国经济健康持续地发展。

关键词: 政党制度; 经济发展; 均衡权力结构; 权力结构调整

中图分类号: F120.3 **文献标志码:** A **文章编号:** 1002-462X(2014)02-0086-05

党的十八大提出增强道路自信、理论自信和制度自信, 但最根本的还是理论自信, 因为任何道路和制度都是在一定的理论指导下形成的。只要有了理论自信, 在其指导下所确定的道路和所建立的制度就应该充满自信。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六十多年以来, 特别是改革开放三十多年以来, 中国人民战胜艰难险阻, 屹立于世界民族之林。但一路走来并非一帆风顺, 可以说历经磨难, 不断受到来自极左和极右两个方面的冲击。譬如, 总有些人喋喋不休地对具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的科学性和可行性发出质疑; 还有一些人一味崇洋, 觉得西方什么都好, 对中国政党制度的合理性和优越性不时发出挑战。为什么不管是极左思潮还是极右思想都有其较广阔的市场呢? 笔者认为这与中国共产党多年来在对科学社会主义的弘扬上只

注重口号式的宣传和政治性的说教, 而缺乏令人信服的数量性论证不无关系。笔者试图对政党制度对经济社会发展的作用机理进行探讨, 以期增强我们的理论自信。

一、全面理性认识政党制度的本质特征

1. 政党制度是一个国家经济和社会发展的政治手段而非目的。第一, 政党制度的确立有利于社会稳定。在政党出现以前无论是奴隶制国家还是封建制国家都以君主的意志作为国家意志, 国家的发展严重依赖于君主的个人主张。君权世袭的制度也使得国家权力只在家族内部传递, 难以保障君主的治国能力。而政党制度的出现有效地改善了这种情况因为政党在确立的过程中需要一定的领袖精神, 具有这种领袖精神的人物将成为党派的灵魂。而为了使政党在执政过程中占据优势地位, 各党派在领袖继任者的选择过程中也会优中选优。因此, 政党制度不仅可以确保提供促进社会经济长期发展所需要的领导人才, 还可以避免为推翻君主专制制度而可能导致社会不稳定的暴力斗争。

第二, 政党制度是社会经济发展的保障。20世纪是人类历史上经济发展速度最快的一个百

收稿日期: 2013-12-11

基金项目: 教育部人文社会科学基地重大项目
(13JJD790010)

作者简介: 张屹山 (1949—), 男, 资深教授, 博士生导师, 吉林省人民政府参事, 从事权力经济学、博弈论、宏观经济分析研究; 高丽媛 (1984—), 女, 博士研究生, 从事权力经济学研究; 辛本禄 (1969—), 男, 副教授, 从事企业理论、制度经济学研究。





年,经济水平成为代表国家实力的象征,经济发展成为各国共同追求的目标。20世纪也是政党制度发展壮大的百年,西方国家逐步完成资本的原始积累过程,从资本主义的发展方式向成熟的帝国主义过渡,同时另一种社会制度——社会主义制度也在战火中萌芽,并在东方国度里生根。虽然社会制度存在差别,但是在全球化发展的背景下,各国都在发展经济的总体目标下或主动或被动地调整着政治制度和政党制度,政党制度成为国家社会经济发展的重要保障。

2 政党制度的确立是不同国情下权力博弈的结果。西方政党制度是伴随着工业革命、启蒙运动这些资本主义萌芽运动逐渐确立的,而亚非拉国家的政党制度大多是在欧洲殖民统治的影响下效仿西方国家形成的。这两类国家的政党制度存在一定的差别。西方国家多实行多党制或者两党制,这是因为在资本主义民主逐渐形成的过程中,不同利益集团所希望实现的利益诉求存在差异,因而结成不同党派,这些党派经过长期发展,经历合作竞争的洗礼后慢慢形成较为稳定的政党格局。而亚非拉国家政党制度的形成大多受到民族独立运动的影响,在民族独立过程中能起到领袖作用的政党成为国家成立后的主要执政党,因此这些国家在建国初期大多是一党执政的^[1]。由此可见,政党制度的确立同一一般性制度的确立有共同之处,是政治或者经济利益集团权力结构的体现。政党制度还随着国情不断演变,这也体现出国家内部不同利益集团之间权力格局发生了改变,是各利益集团之间不断博弈的结果。随着经济发展重要性的凸显,政党制度不单纯决定于政治权力之间的博弈,也受到经济权力的重要影响。

3 不同政党制度之间的过渡与融合。政党制度不是一成不变的,国家内部各个利益集团只能在一定时期内保持权力结构的相对稳定,他们之间的博弈也会在此期间处于一种稳态,一旦权力结构发生变化,政党制度就会随之调整。这种调整也使得不同政党制度之间存在过渡和融合,也正是可以过渡和融合才保证了政党制度能够在和平稳定的条件下进行调整。任何一种政党制度都处在独裁专制制度与公民社会制度这两种极端制度形式之间。政党制度之间的过渡与融合为现代

国家发展提供更广泛的制度选择空间。公民社会和独裁专制制度处于政党制度空间的边缘,并且这个边缘是不稳定的,其原因在于这两种制度都会导致经济社会发展的无效率,与当今各国追求的经济社会发展目标相矛盾。

二、科学解析政党制度对经济社会的作用机理

1 经济社会发展目标实现的权力结构条件。在《资源、权力与经济利益分配通论》一书中,笔者已经利用数理模型证明了在同一层级内不同经济主体权力对等,同一经济主体权力与责任对称,是实现要素充分利用和最优配置的充分必要条件^[2]。制度既然是一种利益分配机制,是社会各个利益集团之间博弈的结果,那么社会资源的优化配置过程和生产要素最优配置过程相类似,其实现的条件就是各个社会主体之间权力对等,同一社会主体的权力与责任对称,这样才能保证社会资源有效的参与社会经济活动,社会福利才能实现最大化。政党制度决定了政府政治权力的行使,因此政党制度影响着社会中利益集团之间的权力结构。若要实现我们所预期的最优权力结构,那么政党制度就要通过调整与之相适应。与最优权力结构相悖的政党制度都无法最大程度地促进国家的经济社会发展。

2 政党制度对经济社会发展作用的权力视角分析。第一,多党竞争执政制度的权力视角分析。西方国家大多采取多党制,其主要特点是执政党仅代表了某些利益集团的利益以换取坚定的执政支持。这部分利益集团与整个国家的利益可能相符,也可能会冲突。在这样的体制下,为了实现本集团利益,各竞争党派必然会不同程度地牺牲其他公民的利益,进而激化不同阶层的矛盾,降低社会福利,特别是执政党与在野党之间的权力争夺过程浪费了大量的人力物力资源,大大影响了政府的执政效率^[3]。虽然多党制通过党派竞争容易形成多个权力对等的、可以相互制约的社会主体,有利于确立和完善社会财富分配中的公共监督,但多党制的最大问题在于难以实现社会主体权力与责任对称,在野党可以不负责任地肆意破坏执政党的正常执政,极力促使执政党执政失败,以便取而代之。在一个社会中,总存在着很多





力量肆无忌惮地希望把事情搞糟,这样的社会怎么能是最和谐、最健康的社会?执政党因为不知什么时候又要轮换执政,所以难有长远打算,通常都是短期行为。在野党和执政党之间的权力争夺战,使其执政能力大打折扣。

第二,一党长期执政制度的权力视角分析。一党长期执政的最大优点是权力和责任对称,即功过自领,无可推卸。在一党执政制度的体制下,政府行为充分体现了政党意志,即代表了社会中最具影响力的集团利益。尽管少数国家的一党长期执政政府代表着某个特权集团的利益,但是随着经济社会的发展,少数特权集团在资源中的占比必然不断降低,执政难以持久,最终在国家经济社会发展过程中起决定作用的必然是该国中的最广泛群体。此时政府力求实现的利益并不集中体现在某部分集团利益上,而是建构在整个国家利益之上。也就是说,一党长期执政体制下执政党与中央政府的一切政务出发点是一致的,就是人民利益至高无上。与多党轮换执政不同,执政党稳固的执政地位不再需要通过利益集团之间的较量来获得执政权,因此在经济社会生活中,执政者背后并没有支持其的资本,进而也无需为某集团利益效力。政府在此过程中的一项重要职能是尽量避免公共权力和私人资本的重合。但是从另一个方面看,一党长期执政的问题在于缺少在同一层级内权力对等的社会主体的制约,这必然导致其权力的不断强化,造成社会资源配置过程中权力结构的失衡,进而导致社会资源配置的低效率或者不公平。

3 从权力视角重新认识中国政党制度。第一,解析中国政党制度的合理性。从我们的分析中不难发现各种制度都不是尽善尽美的,即便是西方国家自我称颂的所谓民主制度也带来了破坏性极大乃至影响整个世界的次贷危机和国债危机,而新加坡的经济腾飞发生在事实上的一党长期执政阶段。中国实行的共产党领导下的多党合作与民主协商制度,在实践中对于达到同一层级内不同社会主体权力对等,进而形成有效的监督和制约机制方面尚显不足,但在达成同一社会主体权力与责任对称方面却具有明显优势。实际上政党制度的确立和演进是国家内部政治力量关系的体现,因此各个国家采取何种政党制度都是

毋庸置疑的。单纯迎合国际舆论而强行改变政党制度只能违背社会发展的基本规律^[4]。

第二,解析中国政党制度的优越性。多党竞选执政的优势在于容易实现社会集团间权力对等并形成有效监督,一党长期执政的优势则是容易实现执政党执政过程中权力与责任对称。虽然是各有利弊,但是关键在于一党长期执政制度存在的问题较多党竞选执政制度存在的问题相对容易解决。因为一党长期执政制度是自己解决自己的问题,只要充分认识到有效的监督和制约对其执政的重要性,并有胆识去践行,就能扬长避短,勇往直前。例如多党合作与民主协商道理上讲既能吸收多党制权力制衡的长处,又可以克服多党制权力倾轧的弊端。但是多党竞选执政制度主要是解决别人的问题,让在野党去配合执政党有效执政是极其困难的,有时甚至是无法办到的。中国的政党制度虽然理论上讲具有合理性和优越性,但合理性是客观存在的,而优越性的发挥则要靠人为的主观努力,因此其实现必须有相应的体制和机制做保障,否则可能适得其反。

第三,中国的政党制度具有极强的执行能力。因为一党领导下的多党合作和政治协商制度只要党内认识统一就少有掣肘,由此促成执政党具有极强的执行力。但执行力本身也是一把双刃剑,若方向和路线正确便可以快速达成预期目标;倘若方向或者路线错误则将事与愿违,破坏力也极强。例如,同样是在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下,“文化大革命”十年动乱几乎把中国经济社会推到了崩溃的边缘,而改革开放三十年所取得的伟大成就却举世瞩目。

三、充分发挥中国政党制度优越性的基本途径

通过前述分析可以看出,中国政党制度在执政过程中具有权力与责任相互对称的天然优势,同时也存在权力主体之间权力结构不容易对等的弊端。为了促进国家社会经济发展,就要千方百计地改进我们的社会权力结构。其根本出路正如毛泽东同志在回答黄炎培先生担心共产党人能否跳出“其兴也勃焉”“其亡也忽焉”的周期律的支配力时说:“我们已经找到新路,我们能跳出这周期律。这条新路,就是民主。只有让人民来监





督政府,政府才不敢松懈。只有人人起来负责,才不会人亡政息。”

1. 加强党内民主建设以实现党内的有效制约与监督。在增强党的执政信念的同时还要不断提高党的执政能力,其有效措施就是推进党内民主制度建设。党内民主的推广能在客观上实现党内各个主体的权力对等,因此党内民主的深入也能提高党在执政过程中社会资源的配置效率,进而提高党的执政能力。党的十六大报告指出:“党内民主是党的生命。”通过民主选举、民主决策、民主管理、民主监督能够增强执政党的执政能力,历史经验告诉我们一党长期执政能够提供长期高速发展的便利条件,但是不当决策也可能造成严重损失,因此一党长期执政更需要卓越的决策者和稳健的执行人。民主选举即在一定范围内实行直接选举、差额选举等措施更能给领导者施以外部压力,促进其自身素质的提高,进一步增强党的执政能力。而民主决策、民主管理、民主监督则可以尽量避免由于个人意识形态和能力差异造成决策和执行的巨大偏差,合作原则下的协商能够发挥集体决策的优势,全面认识事物,拓展问题的解决思路,起到事半功倍的作用^[5]。

2. 调整社会权力结构以实现社会的有效制约与监督。社会的权力结构是复杂和多层次的,政治权力是社会政治生活的核心,因此它也是社会权力结构的基础,能够进一步影响社会中其他权力的特征和行使。政治权力可从不同层面加以分类,从权力主体组织类型划分可将政治权力划分为政党权力、社会公共权力和政治社团权力;从权力功能角度通常可将政治权力分为行政权力、立法权力和司法权力。但是从经济学角度看,政府同时还是经济活动的直接参与者,因此它也具有一定的经济权力。我们所指对于社会权力结构的调整,一方面是调整社会中不同权力主体组织之间的关系,另一方面是调整不同功能的政治权力之间的关系。

第一,调整各种组织间的权力关系。在一党长期执政的政党制度下,执政党处于主导地位,政党权力在政府行为中表现显著^[6]。因此若要实现社会均衡的权力结构,就要调整政党权力与社会公共权力和政治社团权力之间的关系,增强社会公共权力和政治社团权力对于政党权力的监督

和制约。

社会公共权力的行使者是各级政府,因此调整政党权力和社会公共权力的关系就是要调整执政党和政府之间的关系。执政党最根本目的是维护政权的稳定性,因此政党权力只需要满足这一根本需要即可。所以执政党应加强组织建设、干部培养、统战宣传和军事国防这些工作,而对于一般的社会行政事务特别是经济事务只需政府发挥其行政职能,执政党不要直接参与。是从中国的国情看,中国共产党具有稳固的执政地位,党政分离更有助于在更广泛的范围内选贤任能,更大程度上调动人民参与社会管理的积极性。这样不仅能进一步提高政府的工作效率,同时也能使我们党在处理社会矛盾方面有更大的回旋余地,从而有效避免既当运动员又当裁判员的尴尬局面。

其他政治社团也是社会的重要政治参与者,中国确立的政党制度中也强调了多党合作的重要地位。在新中国成立初期,中国共产党获得了各个民主党的强有力支持,推动了新中国进入稳定快速发展阶段。在经济建设的过程中,各个民主党派与中国共产党共同为民族的复兴大业出谋划策,形成了良好的合作关系。虽然各个政党所持有的政治信仰不同,但是各个政党能够长期持续发展反映了其促进国家发展的共同信念。因此在合作的关系下能够避免多党竞选制度为了获得执政权而相互设置执政障碍,破坏社会和谐安定的现象发生。所以,积极听取其他党派意见,接受其他党派监督和制约,加强党派间的学习和合作对于平衡社会权力结构,促进社会团结和经济发展是大有益处的。

另外,通过各种有效制度,架设起社会内部沟通的桥梁是极其重要的。从各国发展经验看,被政府决策边缘化的社会集团是导致社会不安定甚至骚乱暴动的主要力量,只有社会中各成员都能充分表达其利益诉求,其权力得以充分行使,社会才能处于长期稳定状态。目前的多党合作制度能够为实现社会成员间权力对等提供一定的保障。此外还应鼓励非政党形式的社会力量广泛参与社会监督,借助新兴媒体等渠道不断扩展参政议政的途径,充分行使其社团权力,保障政党主导下政府决策更有利于社会经济发展,让历史教训不再重现。





第二,调整各类权力功能间的关系。政治权力是一种具有强制性的权力,这种强制性主要体现在行政权、立法权和司法权中,具有很强的权威性。经济权力来源于社会主体所掌控的经济资源,是一种非强制性权力。在政党主导型的社会,如果政党完全代替政府行使了各种权力,并将这些权力混杂使用,社会必将成为政党意志下的指令性社会,从理论到实践都雄辩地证明这极易造成经济社会活动的无效率甚至是混乱。所以要促进社会经济健康和谐持续发展,就要对各类权力加以区分,并明确其各自的边界^[7]。

一是要明确行政权力与立法权力、司法权力的权力边界。在中国,全国人民代表大会是国家的立法机关,是独立于政府的最高权力机构,法院和检察院则掌管国家的司法权力。对于立法权力和司法权力的保护也是对社会公平正义的维护,公民权利通过法律的确立和执行得以保护,立法权和司法权也是对行政权的最强制约。目前,中国突出的问题就在于行政权力在权力结构中作用过强,特别是现有体制下党政的高度结合无形中放大了行政权力的作用和影响。此外,包含中国在内的现代国家基本都存在行政立法权,比如税收过程中除了由立法机构通过的税收法律以外,还有由行政部门确立的税收条例和规章。这种越俎代庖的做法,由于其确立过程没有通过完善的听证制度、没有充分听取社会各利益集团的意见,那么就可能造成行政权力的不当实行,进而侵害社会成员的切身利益,造成社会总体权利的失衡。因此去除这种行政立法行为,将立法工作交由能体现全社会成员利益的立法机构完成,才能平衡社会权力关系,有效促进经济发展,维护社会和谐稳定。

二是要进一步推进行政权力与经济权力的界限明晰。经过多年探索,企业去行政化取得了阶段性进展,但是国企仍然在经济活动中享有一定特权,比如政府的财政扶持和政策倾斜,这些促使国企在市场竞争中具有特有的优势,破坏了公平原则,损伤了生产积极性。由此可见,政企不分所带来的行业垄断,官员寻租、甚至行业亏损都说明这种形式是不可持续的,政企彻底分离势在必行。此外,国企还在特定情况下担负了不当的社会责

任,以企业名义开展的捐赠活动频繁,特别是在一些大规模自然灾害后国企投入大规模资金参与社会捐助,过度承担了原本属于政府的社会责任,影响了企业的经济效率,也同时导致政府的责任缺位。只有还原国有企业完整的企业性质,才能更有效地促进国家经济发展,也只有明确政府行政权力对经济活动的干预边界,才能建立可长期持续发展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制度。

在不断强化经济发展以确立国家地位的今天,各国的政党制度都面临各自的发展难题。若要社会资源达到充分利用和最优配置,努力实现在同一层级内不同社会主体权力对等、同一社会主体权力与责任对称是其基本途径。而中国政党制度虽然可以通过数理论证雄辩地证明其具有不可否定的合理性和优越性,但在实践中能否得以充分体现,仍取决于我们认识问题的深度和解决问题的力度。十八届三中全会已经拉开了中国全面深化改革的大幕,无论是强化市场在资源配置过程中的决定性作用,还是促进社会公平正义的深化社会主义改革,其根本措施都是要改善社会权力结构,只有完善的社会权力结构才能充分发挥中国政党制度的优越性,才能推动中国经济健康持续地发展。

参考文献:

- [1] 陈金英. 两大党制: 印度多党制分析 [J]. 国际论坛, 2008, (1): 57-61.
- [2] 张屹山, 等. 资源、权力与经济利益分配论 [M]. 北京: 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 2013 233.
- [3] 罗平汉. 如何认识我国政党制度的优越性 [J]. 思想理论教育导刊, 2001, (4): 27-29.
- [4] 王行道. 充分认识和发挥我国政党制度的优越性 [J]. 湖北省社会主义学院学报, 2003, (1): 21-23.
- [5] 王长江. 党内民主须向纵深发展 [J]. 当代世界与社会主义, 2012, (6): 4-7.
- [6] 周胜欣, 刘术泉. 中国独特的政党和政府关系——以布隆代尔政治学理论为维度 [J]. 重庆社会主义学院学报, 2009, (2): 78-81.
- [7] 王长江. 执政党建设前沿问题研究 [J]. 中共天津市委党校学报, 2012, (1): 3-8.

[责任编辑: 房宏琳]

